

创新对中国从未如此重要过

张莱楠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把创新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创新对中国从未如此之重要。事实上,当今,全球经济体系正经历最为重大的重构,经济纽带正从全球生产网络向全球创新网络升级,创新已经从摆脱经济危机的一个政策选项,升格为新一轮全球经济格局重塑中的重大战略选项。

中国正在进入“新常态”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里,一些有别于以往的发展新特征越来越明显。数量型扩张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实现高速增长,特别是随着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供给效率下降。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通过创新来提升国家竞争力。

然而,中国实施创新战略的道路并不平坦,不仅来自于内部压力,更来自于外部的新挑战。对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全球对比发现,创新能力强的发达国家TFP实现了强劲的复苏,对增长做出了可观的贡献。受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美、日、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TFP纷纷下跌至历史低位。但经历过3年的艰难调整之后,美国的TFP对增长的贡献已经在2012、2013年分别回升至

0.7和0.4个百分点。

国际经济秩序正处于新的转型期,各国战略力量的争夺焦点更在于主导权之争,创新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核心战略,近年来主要国家提出科技战略的频率之快、层次之高前所未有。主要发达国家创新战略出现重大调整。新兴经济体国家,如韩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都纷纷提出了本国的创新发展战略。

美国2008年出台《美国竞争法案》,2009年实施《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将创新作为巩固国家战略优势的关键。2011年推出新版《美国创新战略——确保我们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将科技创新确立为制胜未来的关键。欧盟2006年推出了《创建创新型欧洲》和《欧洲研究基础设施路线图规划》,2010年提出《欧洲2020战略》,提出未来十年发展蓝图。德国2010年推出《2020高科技战略》,2011年推出《中小企业创新核心计划(ZIM)》和《工业4.0战略计划实施建议》,德国政府正积极推进以“智能工厂”为核心的工业4.0战略,支持工业领域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的研发与创新。日本于2009年4月推出新增长战略,提出要重点发展环保型汽车、电力汽车和太阳能发电等产业。韩国则在《新增长动力规划及发展战略》中提出:重点发展能源与环境、新兴信息技

术、生物产业等六大产业,以及太阳能电池、海洋生物燃料、绿色汽车等22个重点方向。

为了在全球新一轮竞争中把握主导权和主动权,各国均加大力度,全球创新竞争手段更趋多样且日趋激烈,包括人才争夺、高技术控制、隐性贸易壁垒等。

首先,世界各国几乎都制定有面向未来的创新性人才引进和培养计划,人才特别是高端技术人才争夺十分激烈。美国先后数次修改移民法,吸引全世界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到美国,四分之一的留学生到美国深造,大约一半的留学博士最终留在美国工作;欧盟2011年5月开始实施吸引杰出人才移民的“蓝卡工程”,吸引非欧盟国家的高素质人才。

其次,科技全球化形成全球创新网络,国际科技合作呈现新的方式和特点,共建大科学工程、开展全球性重大问题合作研发、基于互联网虚拟平台协作研究、从科学问题延伸至产业合作等成为新方向。跨国公司主导的研发全球化进一步深入,美国和欧洲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入比重已占其研发总投入70%以上,跨国技术联盟数量在近十年间几乎翻了一番。跨国合作产生的PCT专利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5.8%提高到本世纪初的7.2%。但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对高技术管制不断加强,美国、欧盟等已制定出一整套严密的技术监管体系,形成

“创新挤出”和“创新控制”。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应全面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条。一是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科技资源,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下游的核心、关键以及共性技术进行攻关,通过创新链驱动,突破一批关键技术,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二是以创新链为引导,增强传统优势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拥有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传统企业集聚优势资源加速发展,从而带动整个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

另一方面,要推动开放创新,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创新资源配置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技术在全球流动转移尤为活跃,可以说技术贸易增长速度不仅快于货物贸易,而且也领先于其他服务贸易。根据相关预测,未来10年内中国高科技市场的年增长率将达到20%~40%。意味着更多的通过开放创新和合作创新的模式,接受全球的产业转移基地和研发中心。在创新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中国必须积极构建跨国技术转移平台,帮助企业链接全球资源和市场,以进一步扩大开放为契机,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构筑从国家创新系统到全球创新系统的政策支持体系。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群众团体退出财政供养”是改革所需

何勇海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张泓铭建议,群众团体应退出国家财政供养。他认为,群众团体可以承担群众组织自治管理的职能,但不能承担政府管理的职能,否则就是越位。在他看来,这些群众团体包括工会、妇联、侨联、台联、工商联、残联、文联、科协、作协、对外友协等社团。“群众团体千千万万,只让某些群众团体享受财政供养,是纳税人接受不了的。”

在我国,群众团体确实众多,其中有大量群众团体是需要财政供养的,它们加重了财政负担,给广大纳税人增添了不小负担。比如在上述新闻中,张泓铭就指出,财政部网上公布的“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决算表”表明,群众团体事务支出222亿元多,比当年全国“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和“援助其他地区”两项支出之和还要多21亿元!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庞大。据《凤凰周刊》2013年报道,中国“吃公粮”人口截至2009年就已超过5700万,这个数字已经逼近英国人口规模,并且还以每年超过100万人的速度递增。当年3月17日,李克强作为新一届政府总理,在谈及未来财政收支时表示,未来财政收入再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已不大可能了,但民生

支出是刚性的,不能减只能增,那就需要削减政府的开支。如何削减政府开支?让群众团体退出财政供养,应是一策。

让群众团体退出财政供养,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就有必要对财政供养的群众团体予以分类改革,像侨联、台联、工商联、残联、文联、科协、作协、友协等社团可退出财政供养。

该怎么退出?一个方向是,将一些财政供养的、没有多少实质工作可做的群众团体解散,将其职能并入相关政府部门。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触及一些人或团体的饭碗,消灭一些人或团体的“神仙日子”。另一个方向,是推动那些能够自筹资金的群众团体真正走向市场,自寻活路,依法自治,政府对其自筹的一切费用和结余实行免税,使其不再继续依赖财政“大锅饭”。

当前,为削减政府开支,政府在严控楼堂馆舍的建设,在大力抑制公款接待、公款出国、公款购车等三公消费乃至其他因公消费,在全面减少领导干部职数、清理“吃空饷”。笔者认为,清理和改革吃财政饭的群众团体是接下来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需要认真对待。

发改委称外需今年不可能有很大改善



外需改善路漫漫,增长压力不一般。高速增长三十年,换挡前行护底盘。中国列车穿风雨,创新驱动越雄关。改革红利待释放,未来机遇胜挑战。

郭喜忠/图 孙勇/诗

应让投资者有参与行政和解程序的权利

熊锦秋

近日,证监会发布了《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资本市场将正式试点行政和解,受害投资者除了通过民事诉讼,还可以通过行政和解制度获得直接赔偿。但如何让受害投资者参与行政和解进程,成为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在笔者看来,《办法》规定的行政和解,其中包含有证监会对民事纠纷的调解成分。比如《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确定行政和解金额应考虑的情形包括:行政相对人涉嫌违法行为如被查实依法可处以罚款或者没收违法所得的金额;行政相对人因涉嫌违法行为所获收益、所避免的损失;其他因涉案违法行为所遭受的损失;证监会可就投资者损失情况听取投资者的意见。按规定,涉嫌犯罪的案例不得进行行政和解,适用行政和解的案件即使查实违法违规也只涉及行政处罚以及民事赔偿;也就是说,证监会在有关案例中与行政相对人实施行政和解,不仅要可能对行政处罚数额进行和解协商,证监会作为行政机关,等于

对有关案例中的行政相对人以及投资者之间的纠纷也在同时进行行政调解,其核心是要补偿投资者损失。

调解是化解有关当事人纠纷的重要方式,目前调解主要包括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种方式,人民调解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的调解,行政调解是指具有调解纠纷职能的国家行政机关主持的调解,司法调解是指法院在审理各类案件时由法院主持当事人平等协商的调解。既然行政和解内容包含证监会主持下牵涉各方纠纷的行政调解,那么利益受损投资者或应与和解协商程序,甚至对有关赔偿或民事和解享有一定的决定权,事实上《办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规定在协商过程中应该听取投资者的意见。

但投资者如何参与进来,这应该是推行行政和解制度的一个难点,笔者认为,这方面可以拓展2007年证监会出台的《行政处罚听证规则》,该规则规定证监会可对当事人责令停业整顿、撤销从业资格等行政处罚的,在行政处罚听证,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借鉴台湾经验,笔者建议不妨对行政和解

案件也实行听证制度,听证会参与者不仅包括行政部门和涉嫌违法违规的行政相对人,还包括投资者代表及其律师。

按规定,投保基金公司履行行政和解的管理、使用职责,行政和解案例中遭受损失的投资者可向投保基金公司申请补偿,但补偿数额原则上以投资者受到的损失为限,行政和解在补偿投资者后仍有剩余的上缴国库。显然,有时行政和解金只够补偿投资者损失、没有剩余上缴国库,这个时候也等于间接用行政处罚资金来补偿投资者,这应该算是一种突破,因为《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没款必须全部上缴国库”。不过,或许有些投资者可能对和解赔偿并不大满意,此时他可就同一涉嫌违法行为提起民事诉讼(投资者已通过行政和解金补偿程序获得赔偿的,不应就已获得补偿部分再行请求民事损害赔偿)。但是,对于涉嫌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行政和解案例,投资者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缺乏明确的指导,投资者要获得民事赔偿也是困难重重,这方面几乎没有看到成功案例。

因此,在目前法律环境下,对投资者来讲,通过向行政和解金申请获得一定补偿,远比自己打官司索赔来得现实,可以想见,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会“被迫”接受行政和解金的补偿。但即使投资者全部接受这个补偿,也并不代表和解协议就比较公道。笔者认为,这反过来也证明让受害投资者参与行政和解程序是多么重要,不能因为聊胜于无,就放弃追求,而且,让投资者拥有参与权等也拥有了监督权,这也有利于防止其中的权力寻租,意义重大。

货币政策背后的宏观经济逻辑

温建宁

从“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李克强总理参加代表团所作的表述,可以判断出未来一段时间宏观政策的逻辑:如果经济运行平稳,政策着实偏稳健的基调;如果经济下行失速,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宏观取向将果断出手,把经济运行拉回到合理区间之内。

笔者以“两会”前这次降息为例,尝试分析和说明货币政策的取向,来说明央行理念转换的对应逻辑。

从表面上看,央行降息体现了货币政策连续性的一面,是货币政策适应经济运行态势的表现。央行上次降息是在去年11月21日,两次降息之间仅仅间隔了三个月,恰好是一百天足额的时间,而更前一次利率调整是2012年7月6日,时间间隔长达28个月。然而,这次央行“重启”利率工具,短周期的降息有点超越了微调的范畴,似乎说明央行货币政策的思路发生了变化,也反映出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货币政策出手干预经济的运行。

笔者理解,在经济压力倒逼下,央行快速应对经济变局,这种货币政策思路转变包含两个要点。

一是央行宏观管理向回归传统转变。面对多目标多任务的宏观金融管理,央行经过一段时间探索性的实践,发现内外部经济变化周期缩短,频率相对变化越来越频繁,用创设金融政策工具去管理,管理金融的风险和难度都在加大,与其冒险把金融市场作为试验田,用创设工具间接管理市场,不如回归传统宏观管理方式,稳健的利率型数量工具是最直接的调节的手段,不仅能管得住银行冲动的手,也能管得住不对称灵活降息,促使存款利率空间缩小,进而有效地拉低全社会的利率水平。

不然,利率市场化进展缓慢,市场就难以决定资金资源的配置。就算央行通过创设金融工具,不断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货币之水也到不了嗷嗷待哺的企业,会凭空消失在银行体系大大小小的理财产品这种“海绵”中。改变银行不思进取、轻松获利的生存现状,就有必要改变银行躺在钱堆上赚钱的盈利模式,通过利率调节逐步缩小存贷利差,能有效地促进利率市场化。

二是央行货币政策向调节资金方向转变。任何一次货币政策变动,包括降准和降息以及新创设金融政策工具,都包含着央行政策推行的经济背景。通过这些政策取向,要么测试市场反应的灵敏度,观察市场信号的真实影响和范围;要么检验市场对政策的承受力,观察市场的合理边界和底线;要么看政策的市场功效,以便决定政策的强度和频率。

仔细分析这次央行降息,有货币政策明显的取向。从去年年初以来,全国性地商品房销售陷入低迷期,造成了商品房库存居高不下,去库存活动延续到9月底也不见起色。于是,去年9月30日,央行突然

改变策略,放松二套房贷款限制,测试整个市场反应,而其后的市场反应,总体相对平稳未能大举增长。降息走上了货币政策的前面,但降息不仅未能兴盛楼市,却激活了资本市场,促使资金逃离楼市,货币政策目的未能全面达到。

笔者以为,货币政策的每次变动,都是政策和市场的双向反馈。如果货币政策意图未能实现,政策就提高使用频率、增加实施的力度。其中目的之一,就是调节资金流动方向,引导市场资金流动去向。即要么调节资金在银行体系的流进和流出,要么调节资金在居民手中的投向。一方面是把资金推向市场,将其从银行体系的内循环中逼走,目的就是避免资金滞留银行空转,加快资金在经济活动中的周转能力,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实实在在的金融服务。否则,就创造途径快速回收货币,促使资金尽快回流银行,并锁定在资金池子中,不给予制造通胀风风浪浪的机会。

半年来,央行娴熟地使用加息工具,是敏锐地捕捉了市场信号的结果,也是政策加码提高频率的结果。这次降息超越微调的特征也很明显,不再延续采用前次非对称加息的形式,而采用了表面上对称性加息的形式,但扩大浮动比例也给银行更大灵活空间的同时,也促进了各商业银行之间的市场竞争。

其次,从本质来看,货币政策高频变动原因不在金融政策本身,而在经济的逻辑和背景层面。

央行降息是经济逻辑使然。从国内经济大背景来说,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从高速换挡到中高速运行的中国经济,面临着系列经济发展减速产生的长期问题,也面临着诸多充分就业和提高效率的尖锐矛盾;还面临着大量经济结构极其不合理的分布状况,老龄化人口不断增长、而青壮年劳动力供应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不仅仅面临经济结构调整不到位,将如何进一步发展的的问题,而且将面临经济调整一旦失败,将如何应对经济危机的问题。

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运行态势,促使央行密切关注经济变化的主线,又细致估量市场承受的实际,在做出宏观政策选择时,既不得不慎之又慎,又不得不果断坚决。在金融风险叠加经济动力衰减的时候,先用不对称加息通过牺牲银行的小利益,尽力缓解经济下滑的态势,等各项宏观经济指标触及预警底线时,也能抓住时机采用对称加息保证银行的常态化经营,做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率先稳定,为整个经济的稳定奠定金融基础。

最后,从结果上看,连续两次降息对稳定实体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通过货币政策连续施加影响,能大大压缩了“影子银行”的规模,实现利率市场的真实化和有效化,促使整个社会的融资成本显著降低,减轻投资的利息负担和影响,撇掉实体经济起高成本融资的盖子,让经济更加健康地均衡发展。

综上所述,看清央行的货币政策逻辑,就能准确理解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稳健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要“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让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实体经济”的意图。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声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 0755-83501640;发电子邮箱 pp118@126.com。